

书评

《铁丝网之后：1948至1960年紧急状态下的华人新村》

Behind Barr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陈丁辉博士，《铁丝网之后：1948至1960年紧急状态下的华人新村》（*Behind Barr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20。ISBN：978-967-2165-79-8

陈建发*

（TAN Kian Fatt）

《铁丝网之后：1948至1960年紧急状态下的华人新村》（*Behind Barr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简称《铁丝网之后》）是陈丁辉博士于2020年出版的最新力作。陈丁辉博士成长于仁嘉隆新村（Jenjarom），作者从小便从祖辈听闻关于新村的生活经验，字间不离生活之困苦与殖民统治者严格的管制，还有紧急状态结束后各种民生问题，如农业用地短缺、经济机会匮乏、私会党、赌博和贫穷等。个人的生活体验及深刻的童年记忆使作者对于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华人新村拥有深刻的了解，亦推动作者着手调查从1948年到1960年间紧急状态下的新村社会史。

在《铁丝网之后》中，作者试图重建华人移民在铁丝网之后的社会面貌及人民对新村计划的反馈。为了使这段历史拥有更完整的图像，作者把此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于探讨新村计划的本质及执行方案，其最引人入胜的是作者揭示了暗藏在每一细节之后的心理战术。第一部分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是对于紧急状态的介绍。作者梳理了紧急状态的脉络，并阐述了英殖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所部署的策略及其逻辑与考量。紧接的第二章则说明了新村政策的诞生过程。英殖民政府意识到华人垦民问题及切断民运供给线的迫切性。出任指挥官的布利克斯准将执行了以其命名的“布利克斯计划”（Briggs Plan），并逐提出了“新村计划”。新村计划不仅是为了隔离华人垦民及切断民运供给线，其目标也在于透过提供更为完善的居住环境以在心理层

* 陈建发 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执行员、中华研究硕士研究生。电邮地址：kianfatt.tan@newera.edu.my

面上赢得垦民的支持。在第三章，作者分析新村的环境布局及暗含其中的议程及心理战术。作者说道新村的设施配置，如铁丝网、瞭望台、闸门美其名是为了“保护”居民，实质却是压制个人自由的手段。此外，各类行政部门及辅助团体随着新村的形成而纷纷成立。行政部门是中央权力控制地方的管道；而各类辅助团体，如马华公会、自卫队、合作社、传教士、红十字医疗队等则提供“后续关怀”（after-care）的服务，是英殖民政府塑造亲民形象的手段。设施配置、行政部门及辅助团体三管齐下，揭示了英殖民政府策略之严谨，及其如何为自己的策略建构合理性和神圣性。第四章则交代了殖民政府透过软实力及心理战术，包括为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为村长提供公民课程、发放传单、移动式广播电影单位、投降人员的戏剧表演等，改造“立场不明群体”（Unknown Subject）使之成为温顺且服从的市民。第五章着重探讨英殖民政府在新村实施的各种软硬兼施的政策，包括闸门检查、大镬饭、突击检查、集体惩罚及“后续关心”服务。作者在此章亦展示了居民对于这些政策的真实想法及其表达方式。

在第二部分，作者透过“民众历史”（History from below）检视“官方论述”中对新村计划的粉饰，并探讨新村计划对于居民所产生的影响。若要达到检视的成效，需要丰富的个案及数据以进行比较研究，而作者在这方面展现了不遗余力的努力。作者于2007年和2008年期间，在马来半岛的150个新村中进行田调工作。如此大量的实地考察经验，使作者对于新村间的差异性及多元性有充分的掌握。作者选择了巴登威利（Bertam Valley）、喜州（Gunung Hijau）、布赖（Pulai）和都赖（Tras）四个华人新村作为研究案例。作者在这四个新村之中针对年迈者进行了78次采访，并将重点放在他们在铁丝网之后的生活经历，以及在当地具有重大意义的特殊事件。每个案例不仅说明了当地的复杂性和动态的社会面貌，亦呈现了新村计划“因地制宜”而出现差异性及多元性，比如布赖新村的居民被迫经历数次的迁徙，使之必须在短期内适应频繁的变化；而都赖新村这一案例则说明当地居民如何随着钦差大臣葛尼被刺杀案件而被迫接受集体性惩罚。英殖民政府将新村计划描述为“伟大的社会发展计划”（great social development project），并扬言其作战计划成果赢得了居民的“心灵”（heart and mind）。然书中四个案例的集体回忆无不挑战了上述的论述，比如喜州新村的马共组织刺杀了英国移民官、特别警卫及村长，使当地居民丧失了对于英殖民政府的信心，认为英殖民政府无法有效地保护当地居民的性命。作者透过这四个案例呈现了新村的差异性及多元性，个别新村“因地制宜”的执行方式，加之先天不同的社会结构，使个案之间未曾存在一致的集体记忆。不同声音的交织，印证了潘婉明所言的“一个新村，一种华人”是不切实的。新村成立已有七十载，如今人们普遍关注新村经济的发展，但对于这一政策在人民之中留下了心理创伤则被边缘化，或被选择性遗忘。作者希望透过口述资料将被边缘化的声音带来主流之中，以纠正社会目前对于新村的认识，进而实现对于新村居民的人文关怀。

总体而言，作者透过来自官方和口述的资料，建构了一副完整的新村史图像。作者在“由上至下”（官方论述）及“由下至上”（民众历史）两种不同史观之间取得了平衡，使读者可以透过不同视角窥视新村计划的意义及影响。此书的一大特点在于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口述资料，挑战官方将新村计划描述为“伟大的社会发展计划”的论

述。这一研究旨趣与潘婉明的《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回忆》有异曲同工之妙。相较于潘氏的著作，陈氏更完整地交代了新村计划的脉络与策略逻辑，易于读者反思新村计划的本质及官方对该计划的粉饰；两本著作都翔实地呈现了政策地方性实践所导致的差异性，然在主题分明的框架和综合比较研究下，潘氏成功将兵如港新村及丹那依淡新村“因地制宜”的差异性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陈氏亦成功把案例之间的差异性呈现出来，倘若能将四个案例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案例之间将形成有机的连接，必然为此书锦上添花。然瑕不掩瑜，陈氏的这本著作成功将新村的历史图貌完整地呈现出来，是新村史研究者必读的读物。

不论陈氏或潘氏，两者的研究都充分地利用口述资料。在官方文献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口述资料成为了重构地方史的重要文献。陈丁辉博士透过学术研究将个人的人文情怀付诸实践，即把被边缘化的声音带到主流之中，为新村计划的历史定位给予反思。学者更在书中呼吁重新制定针对东南亚华人在殖民统治下的历史的书方式写，以建构多元视角且贴近民众心声的历史论述。这使此书不论在学术还是人文关怀上都有其重要的价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目前有436个传统华人新村，然学界的研究成果却是严重不成正比的。口述资料，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作为新村社会史的佐证，会随着记忆者的离世而消失，因此新村社会史是学界刻不容缓的研究主题，深入且广泛的田野调查更是建构新村社会史不可省略的工作。笔者希冀陈丁辉博士的著作能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学者从事新村社会史的研究，将被边缘化的心声记录下来，进而促成个案之间的比较，使宏观论述能够更贴近真实面貌，建构属于全民的“大历史”。